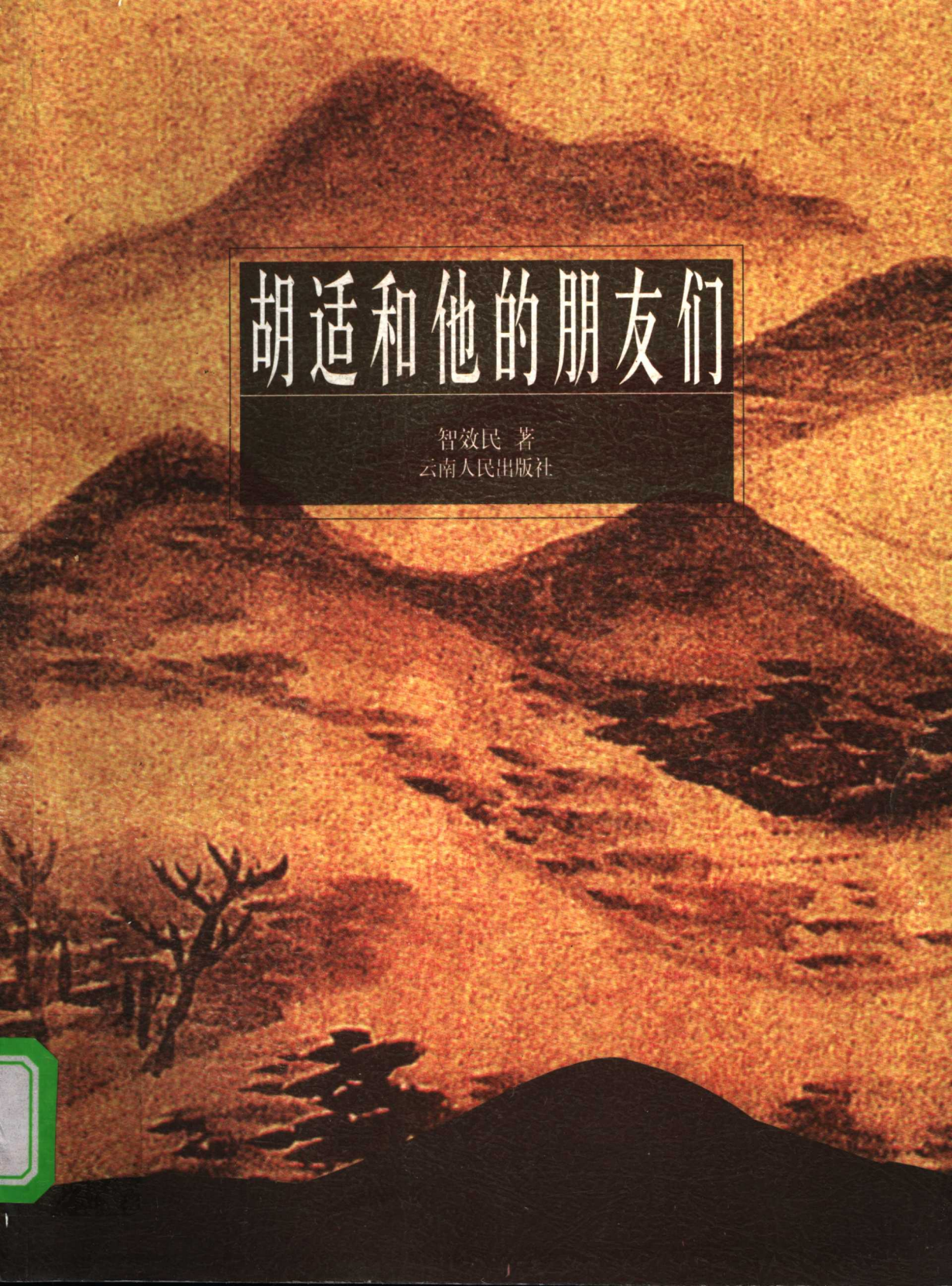




胡适和他的朋友们

智效民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K825.4
125

胡适和他的朋友们

智效民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胡适和他的朋友们/智效民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4.4
ISBN 7-222-04027-7

I. 胡... II. 智... III. ①胡适(1891~1962) — 人物研究
②文化 — 名人 — 人物研究 — 中国 — 现代 IV. 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36890 号

责任编辑: 李绍辉 周 非

装帧设计: 西 里

责任印制: 马跃武

书 名	胡适和他的朋友们
作 者	智效民
出 版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ynrm.peoplespace.net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18.25
字 数	250 千
版 次	2004 年 9 月第 1 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5001~8000 册
排 版	云南里程制版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云南朗明印务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7-222-04027-7
定 价	30.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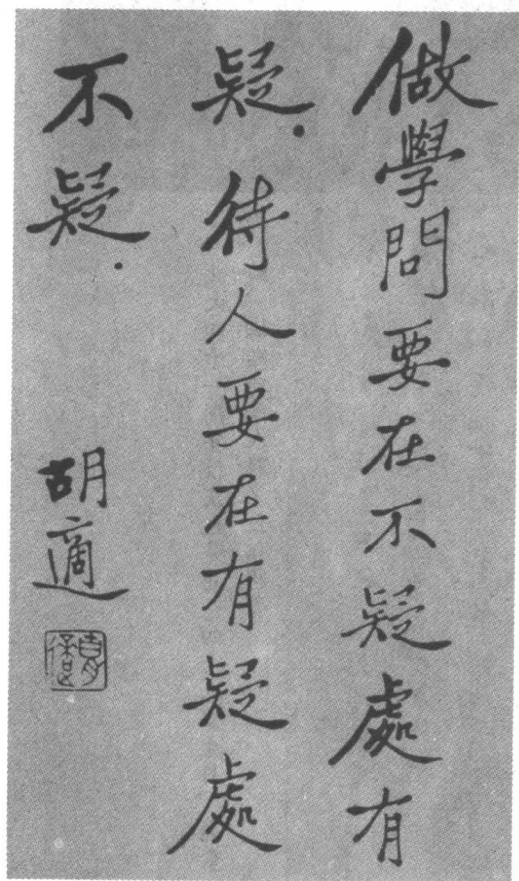
尊敬的读者: 若你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发行部电话: (0871) 4194864 4191604 4107628 (邮购)

胡适送给朋友的自题小照



胡适手迹





北大四十一周年校庆也是胡适四十八岁生日，蒋梦麟、梅贻琦等人联名致信祝贺

适之先生：

今天是学校的生日，也是先生的生日。我们忘不了先生的生日，也忘不了学校的生日。我们刚刚开过纪念会，就写这封信来庆祝先生的生辰。

育子 梅贻琦 杨振声 潘家洵 周作人 樊际昌 郑天抱 周炳琳 李方训 魏建功 陈雪屏 邵力子 陶曾毅 赵迺麟 罗庸 罗常培 沈从文 陈寅恪

北大四十一周年纪念 适之

任鸿隽的科学救国梦/1	
任鸿隽的启示/17	
陈衡哲的双重角色/23	
陈衡哲与三多堂/26	
中国社会学的奠基者——陶孟和/29	
中国政治学的开拓者——张慰慈/42	
徐志摩与《晨报副刊》/71	
张奚若：个人是最终的判断者/74	
朱经农：诗名应共宦名清/86	
北大功臣蒋梦麟/96	
丁文江这个人/100	
自学有方的王云五/103	
杨家有女/106	
杨仁山与金陵刻经处/110	
张元济的人格风范/114	
傅斯年与《大公报》/118	
罗家伦对清华大学的贡献/128	
决策筹边仅此人/132	
杨振声与沈从文/140	
段锡朋：亦儒亦墨亦真诚/148	
胡适与吴健雄/152	
中国第一支小提琴曲的作者——李四光/156	
乐于游人夹道看/159	

想起萧公权	165
蒋廷黻的告别演说	168
梁思成与林徽因	172
愧对李济	180
“二唯”之间读贺麟	185
吴晗论贪污	195
丁声树与《现代汉语词典》	198
《大公报》的“三驾马车”	201
张季鸾办报秘诀	204
王芸生的悲剧	208
王芸生的几个轶闻	224
陈独秀的一篇反贪檄文	227
李大钊论山西	230
被遗忘的思想家常燕生	232
吴宓与常燕生	237
冀贡泉与纽约《华侨日报》	239
冀朝铸的父亲冀贡泉	245
溥仪与斯诺	253
胡适与蒋介石	255
后记	282

任鸿隽的科学救国梦

任鸿隽（1886—1961）是我国最早的科学杂志——《科学》月刊的发起人，也是我国最早的综合性学术团体——“中国科学社”的领导人。作为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他领导的科学救国运动与胡适发动的白话文运动，被誉为五四以来两个重大的文化革新运动。纵观其一生，他始终为科学救国奔走呼号，热情地介绍科学起源、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如今大半个世纪过去了，了解一下他那鲜为人知的思想和经历，会给我们很多启示……

一、攻读化学，是为了制造炸弹

任鸿隽字叔永，原籍浙江归安（今吴兴），出生于四川垫江。当年他的祖父由浙入川，是为了躲避太平军战乱。少年时代的任鸿隽勤奋好学，颇受先生赏识，总是排名第一。1904年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因当地人排外，他只好冒充巴县籍应试，获得第三，成为一名末代秀才。随后，他进入重庆府中学堂师范班就读，第二年毕业后只当了一年教员，便带着120元积蓄，与两位同学顺江而下，去上海求学。

在上海，他进入成立不久的中国公学。这是由被迫回国的留日学生创办的一所学校，其中大多数是革命党人。任鸿隽入校后立刻剪发易服以示革命，并与该校学生胡适、朱经农等人建立友





任 鸿 隽

谊。后来他东渡日本求学，并加入同盟会担任四川分会会长。在日本，他除了旁听章太炎先生的国学讲座外，还考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专攻应用化学。之所以选择这个专业，完全是为了革命。因为他看到革命者们为了推翻清朝政府，往往采取暗杀方式。暗杀需要炸弹，许多人便自己制造起来。由于他们不懂化学原理，不仅事倍功半，还经常出事。在目睹了好友喻培伦、黄复生因制造炸弹而受伤的惨状后，他才做出这一选择。

多年后他回忆往事时，曾对这种功利主义的专业选择做

过深刻反省。他说：“吾此时之思想行事，一切为革命二字所支配，其入校而有所学习，不能谓其于学术者所企图，即谓其意在兴工业，图近利，仍无当也。”（《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第 679 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2 年版，下引该书只标页码）

为什么这样说呢？显然与他后来的经历有关。

二、远渡重洋，探索中国落后原因

辛亥革命后，任鸿隽当即放弃学业回国。临时政府成立时，他与孙中山同乘一辆花车抵达南京，担任总统府秘书处秘书，为孙中山起草文稿并协助处理政务。袁世凯上台后，他去北京政府当过秘书，但由于厌恶官场，学业未竟，遂拒绝蔡元培、

胡汉民等政要的挽留，以“稽勋生”（对革命有功的学生）身份赴美国留学。从此，他的生命“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第715页）

初到美国，他进入康奈尔大学文理学院。在那里，他目睹美国人民的富裕生活，并感受到东西方社会的许多不同：“例如家庭组织，东主合居，西主分处；男女恋爱，东主防闲，西主放任；个人发展，东主裁制，西主自由。”然而他并不满足于这种感受。经过学习、观察、研究，他才对“西方学术之本源略有所见”，并认识到东西方的最大差别，是“西方有科学，东方无科学而已”。为了探索中国无科学的原因，任鸿隽并没有像如今的留学生那样，把学技术、拿学位看得太重。他说：“吾等当日向往西洋，千回百折，有不到黄河心不甘之概，固不在博士硕士头衔资格间也。”（第682至683页）

1914年初，任鸿隽担任《留美学生季报》主编后，在《建立学界论》中进一步表达了这个观点。他说：自清末以来，虽有“无数博士硕士翰林进士”，却不过是饰己炫人、挟术问世、“为利而学”而已，致使中国根本没有一个“为学而学”的学界，这是国家长期衰弱、国人“非愚则谀”的主要原因。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盛衰强弱，于学界之有无成正比。随后他又在《建立学界再论》中指出：要建立学界，增进知识，懂得科学，还必须从归纳法入手。

为此，任鸿隽曾在许多场合对归纳法做过介绍。他说，这是三百年前由培根创立的一种方法，它可以分为下列步骤：一，由事实的观察确定一个假说；二，假说演绎出一个结果；三，用实验来考查这一结果；四，把合乎事实的实验定为科学定律。简言之，就“是用事实作根据，推出一个通则，再用观察和试验证明那通则的不错，这就是科学方法的大概”。（第276页）尽管胡适认为“科学的方法并不全靠归纳”，（《独立评论》第86号《编辑后记》）但是任氏所言与胡适所谓“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并不矛盾。相比之下，《独秀文存》对科学的理解就比较浮浅。



三、创办杂志，介绍科学真谛

1914年暑假，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任鸿隽和杨杏佛、胡明复、赵元任等人一起聊天，在谈到海外游子如何为国效力时，有人提出中国最缺乏科学，我们应该办一种科学杂志。这一提议获得大家同意，经过半年筹备，《科学》杂志于1915年1月问世。这是中国人办的第一个综合性科学杂志，它的创刊具有划时代意义。另外，为了排版方便，该刊采用横排方式并使用西式标点，这在我国出版史上也是一个创举。

从此以后，任鸿隽对《科学》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不仅主持编务，还写了许多文章。为了让读者了解科学的意义，对科学产生兴趣，他的文章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后来他将这些文章汇集修改后，取名为《科学概论》，于192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曾再版）。他在该书序言中说：科学是根据自然现象、依照逻辑方法发现其关系法则的有系统的智识。用这个定义来衡量，那些片段的发明（比如我国的火药和指南针）、偶然的发现（比如人类的用火）和空虚的思想（比如玄学、哲学、经学），都不能算做科学。

他指出，要了解科学，首先要明白科学的两个起源：一是实际的需要，二是人类的好奇。由于前者是外在的压力，后者是内在的冲动，所以就科学发现和科学创新而言，好奇心比实际需要更重要。基于这一认识，他告诉人们：西方科学家研究科学，不

SCIENCE

科學

本期要目

心理學與物質科學之區別
說中國無科學之原因
水力與汽力及其比較
中美農業異同論
生物學概論



民國四年正月

科學社發行

第一卷第一期

每册二角五分

科學社

是为名利所驱使，而是为好奇心所引诱。为了这种天生的好奇以及由此而来的精神需求，许多人（比如阿基米德、伽利略、哥白尼等）甚至不顾自己的生命。因此他反复强调，人类物质文明的进步并不是科学家最初的动机，而是科学研究的必然结果。如果只想从物质文明方面来追赶西方，只想把科学当做一种富国强兵、改善生活的手段，却又不晓得科学的真谛，那就是一种得鱼忘筌、舍本逐末的做法，不仅不会成功，差距还可能越来越大。

既然如此，为什么国人总是以一种急功近利的心态来看待科学呢？他分析说：“吾人学以明道，而西方学以求真”，（第85页）由于“道”与功利是对立的，所以国人面对西方物质文明的巨大成就时，总以为人家把功利放在第一位。殊不知科学也是“明道之学”，是一种只求真理不问利害的学问，所以切不可像洋务派那样，用一种急功近利的心态来对待科学。

在此基础上，任鸿隽还总结出人类“智识不进”的四个特征：一是尊崇古代，二是依赖陈言，三是固执成见，四是观念混淆。这也是我国没有科学的主要原因。他认为欧洲文艺复兴是这种状况的“一个大反动；……他们的主张，是把事实放在思想构造的第一位，那些主义和理论，只放在第二位，或竟不管他”。

（第338页）他说，这是人类社会由迷信时代进入科学时代的主要标志。

四、成立学会，共图中国科学发达

在《科学概论》中，任鸿隽还对科学与常识作了辨析。他借用赫胥黎的话告诉人们，科学并没有什么神秘，“科学是有组织的常识，科学家也不过是有常识训练的普通人”。因此他认为：

“科学精神就是常识训练，……这种精神，不但是一切科学所应有，即是平常处事，……也应该如是。”（第352至353页）也就是说，不仅是科学研究，即便是个人思想行为、社会团体组织，也应该受科学精神支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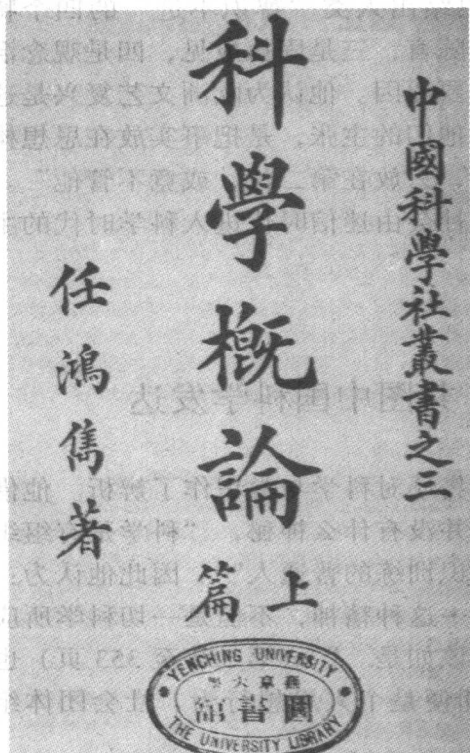


关于科学精神，任鸿隽总结了五个特征：一是崇实，二是贵确，三是察微，四是慎断，五是存疑。他还说，如果再加上不怕困难、不为利诱等品德，就更完备了。相比之下，中国学界却有四大弊病：一是材料偏而不全，二是研究虚而不实，三是方法疏而不精，四是结论“乱而不秩”。面对如此巨大的反差，他告诉大家：西方在中世纪时比中国更黑暗。只是在文艺复兴以后，科学家才把发现真理当做自己的天职，“他们与宗教战，与天然界的困难战，牺牲社会上的荣乐，牺牲性命，去钻研讲求，才有现在的结果。我们若不从根本上着眼，只是枝枝节节而为之，恐怕还是脱不了从前那种‘西学’的见解罢”。（第243页）

竺可桢曾经说过，古代中国之所以没有产生科学，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阴阳五行迷信深入人心；二是数字与度量不被重视；三是士大夫不肯动手，缺乏实验。所以要向中国“移植科学

之花”，既要有不盲从、不附和、不武断、不蛮横、不苟且、不无病呻吟的科学态度，更要有“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科学精神。（《竺可桢文录》第33至41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看来，任鸿隽对科学和科学精神的看法，也是那一代科学家的共识。

《科学》筹备期间，任鸿隽等人曾拟定《科学社招股章程》，决定每股5元（一说10元），共发行股票40份，作为办刊资本。《科学》问世后，大家感到要谋中国科学的发



达，单单发行一种杂志是不够的，因此有改组学会的建议。于是他们重新起草章程，选举任鸿隽为社长，并规定每年10月25日为中国科学社成立纪念日。

按照章程规定，中国科学社要办的事情很多：发行杂志，著译科学书籍，编订科学名词，设立图书馆、研究所、博物馆，举行学术讲演，组织科学旅行团，接受公私机关委托，研究、解决科学上的一切问题。据任鸿隽说，尽管他们对著名的私人学术团体——英国皇家学会并不了解，但是中国科学社从一开始就与它非常相似。英国皇家学会以拥有牛顿、达尔文等科学大师为荣，在科学发展史上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不难看出，当年这批留学生从一开始就走上了—条正确的道路。

三年后，因主要成员先后回国，中国科学社也迁回国内。

五、涉足实业，无功而返

1916年秋，任鸿隽从康奈尔大学毕业，先后进入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深造。在此期间，他参与



胡适(右)、任鸿隽在美国留学

胡适挑起的白话诗之争，这一争论成为白话文运动的先声。不久，他因为主编《留美学生季报》结识了一代才女陈衡哲。陈女士本来是独身主义者，后来被任鸿隽“三万里求婚的诚意”所感动，二人结为夫妇。（《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4册，第1252页，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版）他曾经对陈衡哲说：

“你是不容易与一般的社会妥协的。我希望能做一个屏风，站在你与社会的中间，为中国来供奉和培养一位天才女子。”（第748页）这话让人特别感动。他对妻子好，对朋友更好。据杨步伟说，1933年她和赵元任从美国回来，准备去南京中央研究院赴任，梅贻琦、胡适、任鸿隽都争着邀请他们来自己家住。任鸿隽说：“我太太很少留人住的，对你们两位特别，非住我们家不可。”（《杂记赵家》第276页，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另外，胡适与任氏夫妇号称“我们三个朋友”，也是学界佳话。

任鸿隽是1918年10月学成回国的。在此之前，胡适邀他到北京大学任教，他却有感于许多留学生回国后“以饭碗问题为第一要务”，还是决定先做些调查准备工作，然后再投身于教育或实业，“办出一件新事业”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16页，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3年版）

第二年，他回到阔别12年的家乡，正值当年的革命同志、时任四川督军的熊克武要办炼钢厂，便委托他筹办此事。尽管他认为倡导科学比创办工业更重要，并告诫国人不要因为崇拜实业就把科学忘在脑后，但考虑到此事办成，可以让“已造就的人才有相当的位置”，（同上）他还是答应了这一要求。不久，任鸿隽再度赴美，经考察他决定采用电炉炼钢法，并订购发电机、电炉等设备。遗憾的是，第二年他回国后，熊克武已经离任，使这一计划被迫停顿。所幸他买回来的设备到“九·一八事变”后终于派上用场，与他一同前往美国的周仁后来在冶金方面颇有建树，也得益于这次考察。

大约就在这次考察结束前后，他在《科学与实业之关系》一文中说：在我国，妨碍实业发展的心理原因有三：一是求利太奢，以为“办实业就如开金矿一样，一锄头就要挖一个金娃

娃”；二是求效太速，今天拿出资本，明天就想见效；三是不能持久，一有失败，便心灰意懒，不复前进。他还说，所谓追求利益，不是把别人口袋中的钱抢过来使自己发财，而是要把无用的东西变为有用。（第 222 至 223 页）

六、大学内外，致力于科学教育

1920年考察结束后，任鸿隽夫妇受蔡元培之聘，到北京大学担任教授。从这时起到抗日战争前夕，他还担任过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东南大学副校长、四川大学校长等职。尽管上述任期都比较短暂，任鸿隽还是为科学教育付出了很大努力。

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担任教育部司长的时候，任鸿隽就注意到科学教材的最大缺点，是只讲述已经发明的事实，却没有指出尚待研究的问题，这就很难使学生对科学产生兴趣。他认为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强迫他学习不感兴趣的专业，从事不感兴趣的工作。他非常赞成长期在中国工作的科学家葛利普先生的观点：一个人选择某个专业不是为了谋生，而是因为他喜欢这种工作。也就是说，一个人要想获得成功，必须热爱自己所从事的专业。他还指出，中国的“学术死

[illegible]

任鸿隽夫妇(即叔永、衡哲)是《独立评论》的主要撰稿人

亡率”高达99%以上，是因为许多人在大学毕业后放弃了研究工作，这是一种很大的浪费。

任鸿隽认为，一个人获得博士硕士学位，并不算真有学问；只有经过十年二十年艰苦努力，才能跻身于学者行列。他强调：人不能单靠面包而生活，大学教师的职责不是贩卖知识，而是要培养学生的研究兴趣，让他们明白科学研究的目的不在于物质享受，而在于精神满足。这是一种高尚的刺激和智识的愉快，大学生只有懂得这个道理，养成研究习惯，才能对人类有所贡献。

（第388页）为此，大学教师必须在独立研究中，才能对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具有深切的了解和体会，才能在思想和人格上对学生产生好的影响。他还说，真正的科学是独立的，不依附于任何主义的，把科学和物质文明等同起来，或者“骂科学是帝国主义的”，都是不明白科学的真谛。

1932年胡适创办《独立评论》，任鸿隽夫妇参与其事，并写了不少文章。其中任鸿隽那两篇批评国民党“党化教育”的文章值得注意。文章发表后，虽然有人说“你真大胆，这样的问题岂是可以随便讨论的”，但读者们还是认为它体现了一个“科学家爱真理的精神”。（《独立评论》第8号，第10页）

任鸿隽是1935年9月担任四川大学校长的。为了把川大办成一所现代化国立大学，他从外地请来不少著名学者，并实行一系列改革措施。然而由于地方上落后势力太强，他又不屑于官场应酬，再加上陈衡哲因为发表批评四川的文章遭到地方势力围攻，因此他上任不到两年，就挂冠而去。

七、主持中基会，资助自然科学研究

1925年中基会成立后，任鸿隽担任该会专门秘书、执行秘书、副干事长、干事长等职，是中基会日常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中基会是为了管理美国退还的第二笔庚款而成立的机构，它的全称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任鸿隽说，这个名称有两层含